

全球有四大著名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美国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经济之林中,它们就像所在湾区城市上空俯瞰的华灯夜景,熠熠生辉,璀璨无比。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为1.34万亿美元,经济增速为7.9%,已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四大湾区之首纽约湾区的水平。

纵观前三大湾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强劲的经济势能、开放的发展环境、优质的人才资源、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助力湾区发展的四大因素,与所在地高校的贡献密不可分。

2019年时值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于年初发布。那么,粤港澳三地高校合作的重点是什么?各自又如何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力?不久前,《中国科学报》记者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教合作论坛上得到了答案。

科教合作,输出更多创新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分为东西两岸。东岸主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带,位于东岸的香港、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五个城市,2018年GDP总量达8.4万亿元,占据了粤港澳大湾区77%的经济总量。

西岸主要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包括肇庆、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澳门在内,2018年GDP总量达2.5万亿元,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成为重要任务。

环顾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的特征明显。广东拥有庞大的产业集群,对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需求量大,而香港、澳门虽地处一隅,但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方面有较多积累。过去三方施展空间较小,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平台的建设,港澳发挥的不再只是窗口、桥梁的作用,而是获得了深度融入、参与国家建设的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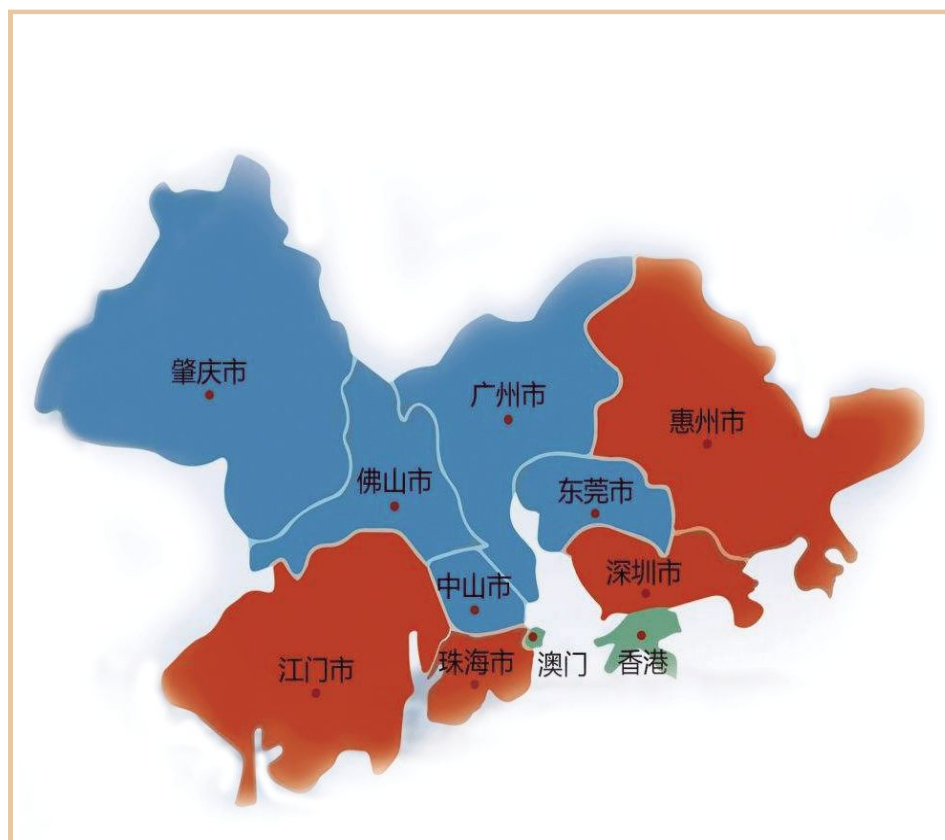
作为东岸中心城市香港的高校代表,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的介绍中,香港主要的大湾区政策范畴将教育、创新科技放在了第一位和第二位。香港未来工作的重点在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平台、推动科研要素流动、推动再工业化、建设科研基建配套。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将青少年教育与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与航空、物流业等作为大湾区重点研究课题。

作为西岸中心城市澳门的高校代表,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表示,作为西岸实力最强的综合型大学,澳大将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科技创新中心,为西岸科技创新起到引擎和辐射作用;全力打造人才培养基地,发挥西岸高等教育的引领作用。如建设产学研基地、共筑科研平台、跨校培养人才。

作为东岸中心城市广州、深圳的高校代表,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看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应以基础研究为核心,为湾区输出更多创新成果。聚焦重大、尖端、基础领域的创新研究;搭建更多科研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产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三地产学研分享转化。

关注青年,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占地6.6万平方千米,人口多达696万。科教合作的实现,离不开越来越多的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各自发力不如歃血为盟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环顾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的特征明显。广东拥有庞大的产业集群,对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需求量大,而香港、澳门虽地处一隅,但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方面有较多积累。过去三方施展空间较小,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平台的建设,港澳发挥的不再只是窗口、桥梁的作用,而是获得了深度融入、参与国家建设的机遇。

创新创业人才加入。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对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有哪些需求呢?

宋永华表示,现代大学应把知识创新、创造与应用结合起来,对教师的要求,不仅在于传授知识,还要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对学生的要求,不仅要掌握知识,还要学习创造知识的方法。进入社会任何领域都需要创造能力,不同阶段的学生,对他们创造知识的能力要求不同——本科生

要培养创造知识、科学研究的兴趣,鼓励他们进实验室,参加科研项目;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要求他们具有创造知识的能力,并且在局部领域能够创造新知识、出科研成果。

除此之外,他认为科教合作不只在知识创造、传播,还在于应用。“甚至要求导师、博士后将自身科研成果,通过不同方式参与企业合作、推广应用。”

近年来,创新创业成为风潮。对于高度商业化、金融化的香港,创业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作为香港主要的大湾区政策范畴之一,青年发展面临的是整个生态环境的挑战。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在这里,他们成立了深圳研究院众创中心,给校友、学生提供创业的机会。“你会发现学生对创业的要求并不多,借助会议室、办公桌、电子邮箱,就可以和企业家人、天使投资者进行交流。”段崇智说。

“现在不只是把专利转让给企业,而是要鼓励师生们带着专利去创业,直接参与知识和技术转化。”宋永华说,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三方面的关系——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处理不当,容易造成重科研轻教学、重科研轻应用的现象。

作为大学校长,他表示应结合本校、本地区需求,营造创业环境,制定政策、措施,实现学生受益,教师发挥潜力,社会得到高校培养的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转化的目的。

开放合作,“和最亲近的人谋事”

此次论坛举办的一个背景是,2016年7月,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粤港澳高校联盟,目前共有28所高校入盟。大湾区之外的高校也一直积极参与到大湾区发展中,如北京师范大学在珠海设立分校(现改为珠海校区),清华大学在深圳设立研究院。

无巧不成书,清华深圳研究院、北师大珠海校区分属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大湾区发展战略提出之后,它们进一步参与到高校合作当中。

“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请求入盟!”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的开场白引来众人喝彩。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特区,在杨斌看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也要仰仗特殊性政策。

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就业机会众多,边工边读成为该地区硕士生生源的一大特点。而这些人入学,最害怕的是每年12月的硕士生入学考试,纯知识性的考核会让不少人存在畏难情绪。那么,在职、非全日制硕士应该大力发展,入学方式也可采用审核制,这与港澳地区的高校录取方式也更为接近。同样,硕士阶段可以考虑降低论文要求,去掉过强的学术性,增加论文的实践性。从入口、出口“双管齐下”,让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生教育插上快速发展的翅膀。

这或许可以为2020年呈现的紧张就业局势提供一个出口。与此同时,杨斌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应减少短引进、聘用条款过松的现象,让只挂名不落实的人才进来,会影响真正愿意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教师加入。

开放合作,才能吸引更多才俊。同样,本土人才的培养也不可或缺。

以师范教育为例。作为联盟的“观察员”,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表示,北师大将开展师范联合工作,以“一带一路”学院、粤港澳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为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均衡发展。未来,北京师范大学将致力打造“教育硅谷”,实现教育大数据、互联网+教育、教育科技研发等成果转化,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Your best friend is next door(近邻乃挚友)”正如段崇智比喻,粤港澳三地高校是“一家人”,和最亲近的人谋事,乐见其成。

高教观点

2019年5月18日是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发布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当前,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正被重新定义,国家文物局、教育部也对高校博物馆建设提出“现代教育体系和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和实践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机构,开展探究式学习、参与式教学、实践教学的教学场所,开展原创科研的重要基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五大功能的定位。据统计,全国现有高校博物馆300多座,涉及自然科技与专题、文化历史、纪念等多个类型,成为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笔者认为,高校要在推动博物馆绿色化发展方面主动发挥引领作用,更好地履行博物馆的生态文化教育传播辐射功能。

博物馆绿色化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内涵丰富,外延正在不断拓展。国际博物馆协会提出,博物馆既是教育场所,又是文化中介,理应以更少浪费、更多合作,以尊重生存体系的方式使用资源,发挥博物馆在提升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方面的独特促进作用。这凸显出博物馆绿色化发展内涵的与时俱进。笔者认为,博物馆绿色化发展的基本内涵应包括硬件建设的节能低碳化、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绿色化、管理运营理念的生态化三个方面。面向未来,高校要积极打通博物馆连接生态文化传统和现代生态文明之间的双向通道,透过双向交流教育活动,实现与公众分享人类共同拥有的绿色文化资源。

基于博物馆绿色化发展具备的系统性、综合性特征,高校博物馆要立足大学特色,重点在提升硬件建设的绿色辨识度,强化博物馆管理使用的节能低碳,打造以绿色科普为重点的博物馆馆藏特色,立足社会互动性的全方位开放,加快数字智慧博物馆的信息化改造提升等方面,进行持续实践。

进入新时代,高校博物馆的绿色化发展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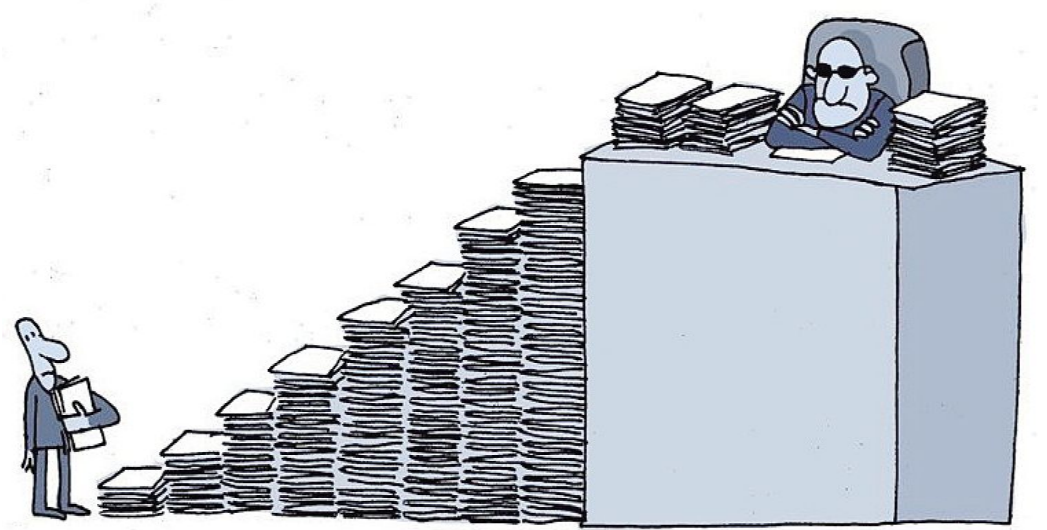
一是切实提高高校博物馆建设的绿色深度和绿色广度,依托高校学科特色与教育传播的优势,创新博物馆绿色化的主题、内容与形式,培育品牌教育活动,创新开发优质绿色科普资源、灵活提供多样化服务项目,加强博物馆绿色科普传播效果的评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渠道,进行互动反馈机制。

二是注重采取“引进来”“走出去”协同发展方式推进博物馆的绿色建设。根据美国博物馆联盟《构建教育的未来:博物馆与学习生态系统》白皮书,博物馆教育具有沉浸式、体验式、自我引导式、动手学习等优势,是绿色公众教育的主要力量。这就要求高校博物馆的绿色发展要多采取联手创建博物馆联盟、组织联合巡回展览、开展馆际业务交流、深入社区开展展览等方式,厚植高校博物馆的绿色发展品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林博物馆、东北林业大学的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等在国内具有一定显示度的绿色主题博物馆要用好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的协同平台作用,加大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国内优秀自然类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在博物馆绿色化的国际合作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

三是高校博物馆的绿色发展和建设既要见物,更要见人。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通过的《上海宪章》指出,博物馆应为全面机构,是为公众全方位参与而营造的空间,也是通过整体性遗产管理实现的物质和非物质、移动和不可移动、自然和文化的空间,应当成为催化创造力的场所。为此,坚持人文理念,点面结合,物质与意识并重,动态性互动与静态性展示共融,搭建与社会公众的体验交流、合作沟通平台,是博物馆绿色化的应有之意。要在师生和公众服务的全过程,体现以人为本,提高绿色志愿服务、绿色导览服务等专业化水平,开发具有生态文化品位的博物馆纪念品。通过“人”“物”的有机结合,实现博物馆绿色低碳建设的新提升。(作者系中国林业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高校应做博物馆绿色化发展引领者

田阳



反对研八股

徐耀

形式主义对科研的危害最大。

形式主义在人才培养上的主要表现是精英教育模式、高校盲目扩招、高校盲目增加非主流专业等。精英是在长期科研实践或生产实践的磨炼中产生的高端科研人才,不是通过几年的重点高校或者海外高校受教经历就可以造就的。毛泽东同志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张国焘是北大毕业,王明是海归。论出身,毛泽东不是精英,但其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比千万个出身论精英都重要得多。所以,精英教育模式是形式主义。至于高校盲目扩招,是形式主义的高等教育普及。高校盲目扩展专业是形式主义在学校的升级。30年前的大专生在叫大学,生源还是那些生源,教师还是那些教师,升级在哪里?形式主义的教育一定培养出按照形式主义思维做事的学生,这些人会毕生贯彻这样的行为。

形式主义在科研基础建设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建大楼、大实验室,买高级仪器等。有了这些硬件,却很难善加利用,造成巨大浪费,这是看得见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在成果转化上的主要表现是“为了转化而转化”。具体来说,就是对技术转化的市场需求认识不足,或者干脆忽视真实的市场需求,把技术转化作为可以用来向社会宣传的类似于成果的事情。技术转化唯一的起因应该是市场的需求,不能用来赚钱或不能很快用来赚钱的技术都不应该追求转化。科研人员热衷于技术转化,多数是急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科研单位热衷于此,则是出于成果和政绩的考虑。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变种,是管理者最容易犯的错误,知识分子官员更容易搞形式主义,因为表面往往看起来很美,但实际却经常好坏参半。在古代,中国文人就是脱离现实的一个官员阶层,王安石曾经大力鞭打过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人,但是文人以脱离基层而自豪。近代以来,中国外侮内患,才有少数文人关怀基层,发现中国的现实如此不堪,遂提出学习西方,但又陷于唯西方理论是瞻的教条主义。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推广,作为政治上被批判的对象,形式主

义和教条主义被一定程度地打击,但是近些年来,各个领域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有所抬头,尤其是在科教领域。

教条主义在科研领域的主要表现是食洋不化。固然西方在大多数学科和领域领先于我们,我们也不应该把人家的东西照搬下来。比如,研究所照搬西方高校的PI制度,学科建设按照西方的套路做,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教条主义的结果就是本来想照猫画虎,却画成了狗。如果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来自苏联的教条主义,使陈独秀在面对“4·12政变”的屠杀时选择放弃抵抗,使王明路线导致红军大失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师承门派,不敢僭越师傅的理论,就是他们容易犯教条主义的缘故。

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科研快速向研八股前进。写申请拿项目就跟科举考试类似,要有平台和团队;建立团队就要有人才;人才认定要靠帽子,戴帽子才有固定的套路;人才的自培养也就是那么一条路;教育体系里舍弃了一切多样性,只追求分数;分数靠考试,考试本身就是八股。在这个链条里,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交相辉映”,让科研领域热闹非凡,一度掩盖了缺乏原创的实质。一旦陷入研八股的深渊,不仅广大科研工作苦劳无功,国家的科研投入巨大浪费,还会对科研事业造成损害。

与研八股斗争是个长期过程。人都有思想惰性,表现在不愿意深入思考,因为思考是一个“焯减”的过程,要做功才能达到。大多数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只会停留在表面,没有意愿去深入。因此,不作斗争的话,形式主义就会大行其道。教条主义者则更懒于思考,拿着现成的理论套用就行,根本不用思考实际问题,他们要么懒惰,要么只考虑如何利用教条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教条往往是很大的大话,用来压人很有效,用来实施却有问题。

借由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人留下的丰厚思想遗产,笔者发现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对科教的危害,知道原因,对症下药,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优秀人才和原创成果涌现出来。(作者系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国科研原创性成果的涌现?很多知识分子见仁见智地提出,缺乏工匠精神、贵族风度与体制不健全、人才不够好等原因,但是只要不断深入思考,你就会觉得这些不是根本原因。

读韩毓海的《重读毛泽东》一书,可以了解毛泽东思想与王明路线长达十年的斗争,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付出的巨大牺牲证明了党八股的危害。这给我们以启发:研究领域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研八股,阻碍了原创的产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表了著名演讲《反对党八股》,他开宗明义地讲——

“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的‘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我们的科研领域当然也存在主观主义(领导干部一言堂)和宗派主义(山头、门派、学霸),这对科研的组织行为损害极大,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是行为方式,其思想根源则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就是研八股。

形式(现象)与本质相对,形式主义就是不顾

问题的实质,施行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科研措施,这是认识论出了问题。

教条(理论)与实践相对,教条主义就是不顾现实情况,不去调查研究,拿来老祖宗的旧办法或外国人的舶来品直接使用,导致措施失效,这是实践论出了问题。

科研领域的形式主义表现在人才评价、人才培养、科研基础建设、成果转化等几乎所有方面,下面分别论述。

形式主义在人才评价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四唯”。海外经历、博士学位、SCI论文(在某些单位是CNS论文)、政府颁布的科研奖,这“四唯”就是科研水平的表现形式中最容易被辨别,当然也是最容易量化的几种类型。这种形式主义的“四唯”实际上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多样性,自然造成选拔人才的单一性,长期发展的结果,类似于砍伐原始森林腾出地方,种植单一树种的橡胶林(产橡胶)或桉树林(造纸)。

选拔人才上的形式主义古往今来都未曾断绝。西汉武帝时实施的举孝廉加速了门阀士族的形成;科举制度到了明朝,考试形式和内容严重形式化,造成人才多样性的缺乏。科研成果实际上只有两种——用于提升生产力的技术和为这些技术进步作准备的理论。因此,对人才的评价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实质性贡献的考察,而不是“四唯”里那些形式。这种